

主编 李天纲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社会学（第四辑）

A PILGRIMAGE OF IDEAS

思想的探险

〔美〕艾迪 著 沈秋宾 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Press

主编 李天纲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 · 社会学（第四辑）

A PILGRIMAGE OF IDEAS

思想的探险

「美」艾迪 原著 沈秋宾 译述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思想的探险/李天纲主编.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7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 社会学)

ISBN 978-7-5520-1858-5

I. ①思… II. ①李… III. ①个人—修养 IV. ①B8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32240号

思想的探险

主 编: 李天纲

编 纂: 赵 炬

责任编辑: 唐云松

特约编辑: 陈宁宁

封面设计: 清 风

策 划: 赵 炬

执 行: 取映文化

加工整理: 嘎 拉 江 岩 牵 牛 莉 娜

责任校对: 笑 然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顺昌路 622 号 邮编 200025

电话总机 021-63315900 销售热线 021-53063735

<http://www.sassp.org.cn> E-mail: sassp@sass.org.cn

排 版: 上海三联读者服务合作公司

印 刷: 常熟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0×900毫米 1/16开

印 张: 20

字 数: 270千字

版 次: 2017年4月第1版 2017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20-1858-5/B.207

定价: 102.00元(精装)

民国西学：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序

李天纲

继唐代翻译印度佛经之后，二十世纪是中文翻译历史上的第二个高潮时期。来自欧美的『西学』，以巨大的规模涌入中国，参与改变了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这在人类文明史上也是罕见的。域外知识大规模地输入本土，与当地文化交换信息，激发思想，乃至产生新的理论，全球范围也仅仅发生过有数的那么几次。除了唐代中原人用汉语翻译印度思想之外，公元九、十世纪阿拉伯人翻译希腊文化，有一场著名的『百年翻译运动』之外，还有欧洲十四、十五世纪从阿拉伯、希腊、希伯来等『东方』民族的典籍中翻译古代文献，汇入欧洲文化，史称『文艺复兴』。中国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大量翻译欧美『西学』，可以和以上的几次翻译运动相比拟，称之为『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中国的文艺复兴』并不过分。

运动似乎是突如其来，其实早有前奏。梁启超（1873-1929）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自明末徐光启、李之藻等广译算学、天文、水利诸书，为欧籍入中国之始。』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发动的明末清初天主教翻译运动，比清末的『西学』早了一百多年。梁启超有所不知的是：利、徐、李等人不但翻译了天文、历算等『科学』著作，还翻译了诸如亚里士多德《论灵魂》（《灵言蠡勺》）、《形而上学》（《名理探》）等神学、哲学著作。梁启超称明末翻译为『西学东渐』之始是对的，但他说其『范围亦限于天（文）、（历）算』，则误导了他的学生们二百年，直到今天。

从明末到清末的『西学』翻译只是开始，而且断断续续，并不连贯成为一场『运动』。各种原因导致了『西学』的挫折：被明清易代的战火打断；受清初『中国礼仪之争』的影响；欧洲在1773年禁止了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以及儒家保守主义思潮在清代的兴起。鸦片战争以后很久，再次翻译『西学』，仍然只在上海和江南地区。从翻译规模来看，以上海为中心的翻译人才、出版机构和发行组织都比明末强大了，影响力却仍然有限。梁启超说：『惟（上海江南）制造局中尚译有科学书二三十种，李善兰、华蘅芳、赵仲涵等任笔受。其人皆学有根底，对于所译之书责任心与兴味皆极浓重，故其成绩略可比明之徐、李。』梁启超对清末翻译的规模估计还是不足，但说『戊戌变法』之前的『西学』翻译只在上海、香港、澳门等地零散从事，影响范围并不及于内地，则是事实。

对明末和清末的『西学』做了简短的回顾之后，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二十世纪的中文翻译，或曰中华民国时期的『西学』，才是称得上有规模的『翻译运动』。也正是在二十世纪的一百年中，数以千计的『汉译名著』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必读教材。1905年，清朝废除了科举制，新式高等教育以新建『大学堂』的方式举行，而不是原来尝试的利用『书院』系统改造而成。新建的大学、中学，数理化、文史哲、政法等等学科，都采用了翻译作品，甚至还有西文原版教材，于是，中国读书人的思想中又多了一种新的标杆，即在『四书五经』之外，还必须参考一下来自欧美的『西方经典』，甚至到了『言必称希腊、罗马』的程度。

我们在这里说『民国西学』，它的规模超过明末、清末；它的影响遍及沿海、内地；它借助二十世纪的新式教育制度，渗透到中国人的知识体系、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中，这些结论虽然都还需要论证，但从一般直觉来看，是可以成立的。中国二十世纪的启蒙运动，以及『现代化』、『世俗化』、『理性化』，都与『民国西学』的翻译介绍直接有关。然而，『民国西学』到底是一个多大的规模？它是一

个怎样的体系？它们是以什么方式影响了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这些问题都还没有得到认真研究，我们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还有，哪些著作得到了翻译，哪些译者的影响最大？『西学东渐』的代表，明末有徐光启，清末有严复，那『民国西学』的代表作在哪里？这一系列问题我们并不能明确地回答，原因就在我们对民国翻译出版的西学著作并无一个全程的了解，民国翻译的那些哲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西学』著作，束之高阁，已经好多年。

举例来说，1935年，上海生活书店编辑《全国总书目》，『网罗全国新书店、学术机关、文化团体、图书馆、政府机关、研究学会以及个人私家之出版物约二万种』。就是用这二万种新版图书，生活书店编制了一套全新分类，分为：『总类、哲学、社会科学、宗教、自然科学、文艺、语文学、史地、技术知识』。一瞥之下，这个图书分类法比今天的『人大图书分类法』更仔细，因为翻译介绍的思潮、学说、学科、流派更庞大。尽管并没有统一的『社科规划』和『文化战略』，『民国西学』却在『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推动下得到了长足发展。查看《全国总书目》（上海，生活书店，1935），在『社会科学·社会学一般·社会主义』的子目录下，列有『社会主义概论、社会主义史、科学的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乌托邦社会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议会派社会主义』等；在『社会科学·政治·政体政制』的子目录下，列有『政治制度概论、政治制度史、宪政、民主制、独裁制、联邦制、各种政制评述、各国政制、中国政制、现代政制、中国政制史』等，翻译、研究和出版，真的是与欧美接榫，与世界同步。1911年以后的38年的『民国西学』为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打下了扎实的基础，而我们却长期忽视，不作接续。

编辑出版一套『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把中华民国在大陆38年期间翻译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著作重新刊印，对于我们估计、认识和研究『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中国的文艺复兴』，接续当

时学统，无疑是有着重要的意义。1980年代初，上海、北京的学术界以朱维铮、庞朴先生为代表，编辑『中国文化史丛书』，一个宗旨便是接续1930年代商务印书馆王云五主编『中国文化史丛书』，重振旗鼓，『整理国故』，先是恢复，然后才谈得上去超越。遗憾的是，最近三十年的『西学』研究却似乎没有采取『接续』民国传统的方法来做，我们急急乎又引进了许多新理论，诸如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还有『老三论』、『新三论』、『后现代』、『后殖民』等等新理论，对『民国西学』弃之如敝屣，避之唯恐不及。

民国时期确实没有突出的翻译人物，我们是指像严复那样的学者，单靠『严译八种』的稿酬就能成为商务印书馆大股东，还受邀担任多间大学的校长，几份报刊的主笔。但是，像王造时（1903-1971）先生那样在『西学』翻译领域做出重要贡献，然后借此『西学』，主编报刊、杂志，在『反独裁』、『争民主』和『抗战救国』等舆论中取得重大影响的人物也不在少数。王造时的翻译作品有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摩瓦特的《近代欧洲外交史》、《现代欧洲外交史》、拉铁耐的《美国外交政策史》、拉斯基的《国家的理论与实际》、《民主政治在危机中》。1931年，王先生曾担任光华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政治系主任，后来创办了《主张与批评》（1932）、《自由言论》（1933），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2）。他在上海舆论界发表宪政、法治、理性的自由主义；他在大学课堂上讲授的则是英国费边社社会主义、工联主义和公有化理论（见王造时著《荒谬集·我们的根本主张》，1935，上海，自由言论社）。非常可惜的是，王造时先生这样复杂、混合而理想主义的政治学理论和实践，在最近三十年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中并无讨论，原因显然是与大家不读，读不到，没有再版其作品有关。

我们说，『民国西学』本来是一个相当完备的知识体系，在经历了一个巨大的『断裂』之后，学者并没有好好地反省一下，哪些可以继续和发展，哪些应该批判和扬弃。民国时期好多重要的翻译著作，我

们都没有再去翻看，认真比较，仔细理解。『改革、开放』以后，又一次『西学东渐』，大家只是急着去寻找更加新颖的『西学』，用新的取代旧的，从尼采、弗洛伊德……到福柯、德里达……就如同东北谚语讽刺的那样：『熊瞎子掰包谷，掰一个丢一个。』中国学者在『西学』宝库中寻找更新式的装备，在层出不穷的『西学』面前特别害怕落伍。这种心态里有一个幻觉：更新的理论，意味着更确定的真理，因而也能更有效地在中国使用，或者借用，来解决中国的问题。这种实用主义的『西学观』，其实是一种懒惰、被动和浮躁的短视见解，不能积累起一个稍微深厚一点的现代文化。

讨论二十世纪的『西学』，一般是以五四『新青年』来代表，这其实相当偏颇。胡适、陈独秀等人固然在介绍和推广『西学』，倡导『启蒙』时居功至伟，但是『新文化运动』造成不断求新的风气，也使得这一派的『西学』浅尝辄止，比较肤浅，有些做法甚至不能代表『民国西学』。胡适先生回忆他们举办的《新青年》杂志，有一个宗旨是要『输入学理』，即翻译介绍欧洲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知识，他还大致理了一个系统，说『我们的《新青年》杂志，便曾经发行过一期『易卜生专号』，专门介绍这位挪威大戏剧家易卜生，在这期上我写了首篇专论叫《易卜生主义》。《新青年》也曾出过一期『马克思专号』。另一个《新教育月刊》也曾出过一期『杜威专号』。至于对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日耳曼意识形态、盎格鲁·萨克逊思想体系和法兰西哲学等等的输入，也就习以为常了。』（唐德刚编译：《胡适口述自传》，北京，华文出版社，1992年，第191页）。胡适晚年清理的这个翻译目录，就是那一代青年不断寻找『真理』的轨迹。三四十年间，他们从一般的人性论学说，到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从不列颠宪政学说，到法兰西暴力革命理论、德意志国家主义思想，再到英格兰自由主义主张，大致就是『输入学理』运动中的全部『西学』。

胡适一语道破地说：『这些新观念、新理论之输入，基本上为的是帮助解决我们今日所面临的实际

问题。』胡适并不认为这种『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的做法有什么不妥。相反，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接受『西学』的方法论，大多认为翻译为了『救国』，如同进口最新版本的克虏伯大炮能打胜仗，这就是『天经地义』。今天看来，这其实是一种庸俗意义的『实用主义』，是生吞活剥，不加消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简单思维，或曰：是『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从我们收集整理『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的情况来看，『民国西学』是一个比北大『启蒙西学』更加完整的知识体系。换句话说，我们认为『五四运动』及其启蒙大众的『西学』并不能够代表二十世纪中国西学翻译运动的全部面貌，在北大的『启蒙西学』之外，还有上海出版界翻译介绍的『民国西学』。或许我们应该把『启蒙西学』纳入『民国西学』体系，『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才能得到更好的理解。

我们认为：中国二十世纪的西学翻译运动，为汉语世界增加了巨量的知识内容，引进了不同的思维方式，激发了更大的想象空间，这种跨文化交流引起的触动作用才是最为重要的。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变得不古不今，不中不西，并非简单的外来『冲击』所致，而是由形形色色的不同因素综合而成。外来思想中包含的进步观点、立场、方案、主张、主义……具有普世主义的参考价值，但都要在理解、消化、吸收后才能成为汉语语境的一部分，才会有更好的发挥。在这一方面，明末徐光启有一个口号可以参考，那便是『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先翻译』。反过来说，『翻译』的目的，是为了中西文化之间的融会贯通，而非搬用；『会通』的目的，不是为了把新旧思想调和成良莠不分，而是一种创新——『超胜』出一种属于全人类的新文明。二十世纪的『民国西学』，是人类新文明的一个环节，值得我们捡起来，重头到底地细阅读，好好思考。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邀我主编『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献弁言于此，是为序。

「美」艾迪 原著 沈秋賓 譯述

思想的探險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五月初版

應序

本書著者艾迪博士，在不算很短的六十餘年的時光中，至少用了四十年在事業上作積極的努力，以及富於創造性的建設。他從不爲自己的幸福有所打算，他祇爲利他而奮鬥；他從不爲謀生而操勞，或設法使他的財產加多。他說：『我們應當使工資的要求降至零度，而在內心方面就應當要求一切』。他看人生是一種長時期的光榮的冒險，也是人們在困苦患難中的一種刺激和挑戰。人們如能憑着這些去戰勝時代中的不能避免的痛苦，那美滿愉快的將來就離我們不遠了。

艾博士又覺得人生是不完備的，是有缺點的。他說：『我們必須承認我們的限制，必須承認詩篇的作者所說的一句話：「這是我弱點」』。但他並不因此而感覺悲觀和失望，他是要同他的缺憾和過處竭力掙扎的。他說：『我在工作的時候是抱樂觀的；如果我們成績不好，或不能立見功效，我照樣是抱樂觀的……我是能使樂觀和悲觀處於平衡的地位的。我可以請悲觀者來爲我指出一切黑暗的事實，但他決不能奪去我的信仰，和我的抱樂觀的決心』。艾博士在樂觀上的自信，於此可見一斑了。

除了抱樂觀的精神以外，艾博士也有他的人生哲學；但他的人生哲學『不過是一種謙卑的哲學』。那是他的『安心立命的所在』。他覺得他所以要存活，目的是在尋理事物的意義和存在的價值。他說：『依我看來，哲學是一種實行的理論，使我們能知道含有目的的種種活動，並以之改變這個世界使它成爲』

一個可以供我們居住的更好的世界。」

★

★

★

宗教的經驗在艾博士的一生中含有創造性和力量，同時又是他的經驗的中心。他在宗教一方面，確曾有過許多次的探險。他同情於戰後青年的反對宗教，特別是有組織的宗教。他承認在歷史上，有組織的宗教和社會制度及經濟制度中的罪惡發生關係，但他一方面雖承認宗教為一種富於保守性的勢力，一方面却承認在創造的方面，宗教是世界的一種最強有力的推動力。世界上有許多主張自由思想和社會正義的人，他們的最初的動機是得之於宗教的大戰以後，宗教雖含有一種社會的經驗，但艾博士却深信宗教必須是個人的，而兼含社會性的。他在宗教信仰上是極其虔誠的，每天早晨均覺有新禱和讀經的必要，猶如他需要養身的早餐一般。

★

★

★

在艾博士的眼光中，戰爭是競爭制度中的一部分，它一方面能引起內部的階級戰爭，一方面又能引起國外的乃至世界的戰爭。他又覺得戰爭是他在思想中探險時的一種重要挑戰。他曾有過一次大戰的經驗，且曾見到戰爭中可怕的現實。他是不贊成對戰爭持中立性的；他不是積極反對戰爭，便是積極贊成戰爭；要他對戰爭持一種不加可否的態度，那是不可能的。就艾博士的性情而論，他沒有贊助和平主義的傾向。他在未上前線以前，簡直看戰爭是一種神聖的十字軍；以後他在戰場上見到了許多殘殺和流血的

情形以後，他便開始對戰爭引起了懷疑，並且深感良心上的不安。自此以後，他就在可能範圍以內，盡力阻止戰爭的發生。他決不接受國家或教會的命令，去作大規模的毀滅工作——戰爭。他是準備入獄或捨生，不願使戰爭的罪惡延長在人世間。最後他就同戰爭斷絕一切的關係，那就是說：他不願參加未來的任何戰爭；因他已在生活中找到了『戰爭的替代品』。

★

★

★

艾博士因了戰爭的經驗，不但着手查攷戰爭的原因，並設法發見經濟制度中的社會罪惡。他覺得大都市中的政治和社會情形，所以會如此腐敗，根本的原因是在經濟方面，尤其在一般企圖享特權的商人。他說：『商業制度的特利，特權，特許，和法律等，在許多地方是和賄賂及腐化等相連的；那連在一起的許多罪惡，最後便造成一種繼續性的法則，把一個在理論上含有民主性的政府，變成了一種財閥的政治制度；而這種制度並不能為人民盡服務，祇能為一班尋求特權的人們服務。』他又說：『經濟制度中所產生的罪惡，漸漸地充滿了整個的教育制度和教會制度並有逐漸控制這二者的趨勢……經濟制度所造成的悲劇，往往會使百萬以上的人慘遭死亡，或困守在貧民窟中，或被監禁在牢獄中。』艾博士本人雖是從資產階級中出身的，但他却反對美國的大財閥。據他看來，美國大部分的財富是得之於各種專利權，和種種反社會的非法手段的。此外如貧富之間的一種極顯著的對照，財富分配的不均，以及富者利用貧者以為生產的工具，而坐享其利，更是無可諱言的事實。那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既這樣的不公道，這樣的無效率，

結果必致引起內部的衝突，而促成它的根本的崩潰。艾氏鑑於資本主義之宣告失敗，覺得有提倡兩種程序的必要，這就是說：『一方面設法改進工人、農民、受僱者和失業者的命運；一方面利用教育和強制方法在各地創造新的社會制度。自由主義者主張在現社會的範圍內提倡改進，我是一個思想激烈的人，所以我主張把新的社會制度重新建造起來。但是我們在資本主義的舊社會中建造起新的社會主義時，我們仍可維持這個舊的社會，不必把它立即毀壞。但如果要這樣做，那就非有熟練的工程和合作不可了；光是憑着戰爭和革命，是不能達到這個目的的。』

論到階級的鬥爭，艾博士承認這是不可避免的事實，他並且和它表同情；但他贊成竭力避免階級戰爭的恐怖，至於工人們的罷工，他認為這是他們的權利，也是他們唯一的利器。

艾博士清楚地聲明，他是不贊成資本主義，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理由是這樣的：資本主義是不公道的，和無效率的；法西斯主義是專制的，它的興趣是狹窄的；共產主義是主張專橫的階級專政，以及對於敵人之仇恨的。他又聲明他是贊成社會主義的，因為『社會主義主張把主要的生產工具迅速地社會化；如果是可能的話，它又主張用同意的方法——而不用強迫——去達到這目的；用建設的進化的方法——而不用強暴的破壞的革命——去達到它的目的。』這個便是他認為在社會正義和經濟制度中作思想上的探險時，應當尋求的一個大目的。

★

★

★

艾博士的過去六十餘年，是在積極的與多方面的活動中過去的。他的生活是極有紀律的，他的腦經是強健活潑的；他抱着一顆熱烘烘的心，去尋求他所贊成的真理和實在他關心於社會和經濟制度中的種種罪惡，以及民衆的一切痛苦。他乘着一種求知的慾望，去同國內外千變萬化的事實多有接觸。所以我覺得艾博士這一生是非常努力的，是值得存活的。此外艾博士更有許多地方，可以做我們青年人的模範，因此，我便在把全書校讀一過以後，將我個人對於艾博士的一些感想寫了出來，使讀者在未讀本書以前，對於艾博士的爲人能知道一個大概。如果我能做到這小小的一點，我的目的便算達到了。

應遠濤

五月十五日

原序

『思想的探險』所記錄的，是一個人，在過去六十三年內所經過的幾個里程碑。如果換一個比喻來說明，這部書所記載的，至少是人民生活動影片的若干標題，在著者記憶的心眼前一一的經過。這部書顯然是自傳性質的。一個人談論到他自己的時候，往往有一種自負的心理。我寫這部書的時候，並不以抱歉的話爲開場白；因這部書是自動的寫述它自己的；但我覺得我應當寫它。雖然這樣，我是不大對自己感覺興趣的，我所感覺興趣的，倒是我自己的思想；因這能佔領成見之內心的堡壘，並能抓住我的一顆不願意的心。在思想一方面，我是時常被推動着，使我放棄保守主義，而傾向於自由主義，再由自由主義而傾向於過激主義。但所謂保守主義，是指一個人要想在現狀之下保持他自己的特權。所謂自由主義，是指一個人在現社會制度之下，希望有適當的改革。所謂過激主義，是指一個人對於一個問題或一種思想，要追根究底地去徹底研究，並力謀促成一個新的社會制度的實現。我個人對於現有的自私的特權制度很不滿意，我願盡力贊助關於現制度的每一種改革運動；同時我願意用非武力的方法，從根本上建造一個全新的社會制度。

這部書在起始時雖是自動寫述它自己的，但並不是繼續如此的。因爲在不久以後，我便碰到了困難。我原打算把這部書寫成二十二章，但這樣就非寫成兩大冊不可，並且需要幾年的工夫。當我把第一冊寫

得極充分的時候，我便決定把第二冊放棄，不再理會它也許我還能活下去，使我可以寫成我的自傳的第二冊，但我却願意節省讀者的時間和精力。

現在我正在準備我的另一次的長時期的旅行，我是打算經過中國，並且要環遊世界。世界的情勢或許是變化無窮的，而世界時事的活動影片，也會無止息的推進着；但我却願意使我過去六十年的生活在這裏告一個段落；至於此後的生活，我願意讓它自動地進行着，因為本書的篇幅裏，包含過去四十餘年的一個很長的時期，我便自由的採用我的幾部前著裏的若干事實和資料。

我要特別感謝我的可愛的批評者愛得華傑金斯（Edward Jenkins），他是美國威廉大學校長；

我所敬愛的同工荷倍潘琦（Kirby Page），和我的朋友傑明蓋姆倍爾（Benjamin Kempel），

因為他們對於我的稿本的一部分，曾給以有價值的批評和建議。我是時常在想到，也許別的人沒有比這幾位更好的朋友了。我也覺得，和幾個不以單純的獲利為目的之出版者有交接，也是我生平的一種愉快。

我將這部書獻給我的八十六歲的母親，和我的一個快到兩歲的小孫子。我曾抱他坐在我的肩頭上，走到他第一次到過的遊戲學校裏。在片刻之間，他便從我的肩頭上爬下來，搖搖擺擺地步入到『生命』中去，高興地大膽地忘其所以，張開了一對驚奇的眼睛，在四面觀望着；我們希望它們會時常這樣的我覺得抱憾的是，我不能把我過去數十年內用代價買來的寶貴經驗傳給這個孩子，也不能阻止他不犯許多不可避免的錯誤。但我知道他是向着一個新的世界前進着的，這個新世界是永不完備的，永不能接近烏